

道家与旅游 集



黄德源 著

9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 周 萍

封面设计 黄德源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5 插页 1 字数 155000

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80515-584-4/F·180

定价: 3.50 元

序

德源先生任教于上海旅游专科学校。他从事旅馆管理专业，然有志于旅游资源学术的探讨和研究，此书就是他近几年来的一部力作。

本人虽曾走南闯北，不乏“旅”的路程，而极少“游”的福份。排去心感目染，从读书的体会来品味，作者的视野是开阔的。以往的旅游文章一般侧重于旅游资源历史性、文学性的内容，而本书在论述我国旅游资源特点形成过程中，独辟蹊径，提出了衡量旅游资源的标准在于它们对人的直觉感受性。在旅游领域里，一切历史性、文学性的内容只有转化为人的直觉感受的特征（包括时空痕迹趣味和时空感受效果）才有意义。鉴于我国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事业方兴未艾的实况，本书对如何开发和保护我国旅游资源想必不无指导作用。

此外，本书作者在分析和考察我国传统旅游资源特点形成原因时，按历史的本来面目阐述了道家思想对旅游和旅游资源的影响；不仅淋漓痛快地讲出了前人之所未言和前人所未敢言的历史事实，挖掘了我国旅游资源社会、历史、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深层结构；而且对如何发展我国旅游资源的传统优势，保持旅游资源的特色，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而在理论上肯定了我国旅游资源在世界旅游中的特殊地位。

本人详读此书，似有茅塞顿开之感。其中不少见解不落前人窠臼，饶有创见和创新。即便是一家之言，相信通过这一领域里学

者的研讨,也将是十分有益的。

韩天衡
84.2.27

韩天衡：上海画院副院长、上海书刻家协会常务理事，1985年列入世界名人录。



老子曰：道法自然

目 录

一、道家学说中的旅游思想	(1)
道家旅游思想渊源	(1)
道家旅游思想的特征	(11)
道家思维方式及其特征	(22)
道家旅游思想的理想模式	(30)
二、道家旅游审美观	(39)
否定式旅游审美观	(39)
道家旅游意境说	(47)
道家旅游审美观对古典园林的影响	(56)
三、道家与旅游资源	(64)
道家影响旅游资源的方式	(64)
道家在五岳定位中的作用	(68)
汉代画像石中的道家烙印	(75)
峨眉山“仙话”与道家旅游资源	(78)
道教旅游资源范围	(84)
道家音乐理论与道教音乐“仙味”	(96)
炼丹、符箓法术和五岳真形图	(104)
四、著名道家、道教旅游地揽胜	(112)
蓬莱仙阁	(112)
福建莆田湄州妈祖庙	(114)
泰山道教和碧霞祠	(116)
华山和夷希先生	(119)

嵩山和嵩山中岳庙·····	(124)
北京白云观·····	(127)
崂山太清宫·····	(130)
神秘的武当山·····	(132)
道教第五洞天青城山·····	(136)
龙虎山、三清山道教自然旅游资源和天师府·····	(139)
罗浮山和冲虚观·····	(143)
永乐宫及其壁画·····	(145)
天下第九洞天林屋洞·····	(149)
天下第一福地楼观台·····	(150)
茅山和茅山道教·····	(151)
附录 ·····	(155)
道德经(楼正本)·····	(155)
庄子·逍遥游·····	(176)
道教的黄帝祭祀·····	(179)
鬼谷子其人、其事及其隐居地·····	(181)
旅游女神西王母·····	(183)
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二十四治·····	(190)
五岳、五镇、四海、四渎祭祀·····	(196)
干支纪时和十二属相·····	(197)
中国历史年代简表·····	(199)

一、道家学说中的旅游思想

道家旅游思想渊源

道家是我国先秦时期以“道”的学说为中心的学术派别，其思想崇尚自然，主张清静无为。历史上，它与儒、墨、名、法、阴阳、纵横、农、杂等学术派别统称为“九流”，相互之间展开过激烈的辩论，对社会的发展进程和学术的繁荣起过重要的作用。后人对道家学说从哲学、政治、伦理，以及文学、天文、兵法、养生等等方面作过大量而系统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现在看来都没问题，也是必要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道家学说中还有一个被人遗忘却又十分重要的思想，即旅游思想，至今鲜有人提起或研究。其实，道家的旅游思想在道家学说中占有特殊地位：一方面，它为我们理解“道”的渊源和本质，提供了一把钥匙，要知道，“道”正是通过“游”得到阐发的；另一方面，它又为我们把握中国传统旅游及其旅游资源的历史发展指出了一条捷径，为发展中国今日之旅游提供了历史的借鉴。中国的传统旅游，可以说发端于道家。因此，挖掘、研究道家的旅游思想，已成为当代研究道家学说，特别是中国旅游理论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

《老子》是道家创始人老子所著的道家经典。书中虽无“旅”、“游”字句，但老子用“道”来说明宇宙万物的演变，提出“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本原观；憎恶当时社会动乱、贫富悬殊，主张“清静”，“寡欲”，“绝圣弃智”，“无为而治”，幻想人类回复到“结绳而用之”的原始状态，这就给以

以“回归自然”、“恢复人之本性”为核心的道家旅游思想的产生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而老子本人亲自前往西域寻觅心目中的“小国寡民”理想社会，开创了古代文人学士旅游的先例，为后人所仿效。

战国时期哲学家庄子（约公元前369—前286年），《史记》称“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他全面继承并发展了老子的道家学说，为老子之后的最重要的道家思想代表。《庄子》是全面记载庄子思想的道家经典，为庄子及其后学著。《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现留下来只三十三篇，分内篇、外篇、杂篇。其中内篇七篇，一般认定为庄子所作。在《庄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游”字大量出现，并且用“游”来阐述“道”，“游”、“道”相融，密不可分，从而使“游”在道家学说中占居突出地位。《庄子》内篇的首篇即是《逍遥游》，以“游”开导，贯穿全文。道家旅游思想在《逍遥游》篇中表现得最为集中，最为系统，最为深刻，以该篇为中心探索道家旅游思想的渊源是最有代表性的。

《逍遥游》，行文扑朔迷离，思想含蓄深藏。以往道家学者通常把它看作是庄子对其哲学上“道”的阐述，或对得“道”者精神状态的描述。现在，我们要向读者说明，《逍遥游》中的“道”是怎么和“游”联系在一起的，庄子怎样用“游”来论述“道”的，揭示道家旅游思想哪些特征，传递了哪些古代旅游信息。

庄子《逍遥游》篇的中心词是“游”。为分辨此“游”的涵义是否就指古代旅游，我们首先应对“游”字进行全面的考察分析。

“游”，据《说文》解，本指旌旗上的飘带，象形，旗“游”顺风。就行为而言，“游”主要是指动物在水里运动的方式。鱼运动方式是“游”，鱼游顺水。石鼓籀文第一石的内容为：“称道汧源，游鱼之乐”，“叙其风物之美以起兴”。以郭沫若的诠释，这是记载秦襄公的一次旅游活动。观游鱼是这次旅游活动原始动机之一，“游”引申出“顺”，“顺”寓意着美。

“游”古字有两种写法：“游”从水，指同水上活动有关的行为；“遊”，从足，指同陆上活动有关的行为。在古文中“游”可代替“遊”，用来表现同陆上有关的行为；而“遊”不能替代“游”，用来表现同水上活动有关的行为。这种区分，很可能暗示着这样一种情况，游的概念是从水上活动扩大到陆上活动的，从顺水而游，发展到行为顺应环境的观念意识，“游”本质上是一种顺应自然规律的行为。从考古发掘来看，它同原始艺术发展历程是一致的。我国原始艺术的题材，有相当数量是表现水上活动的。撇开远古图腾不谈，因为它同民族历史、民族文化起源、社会风俗、原始宗教意识等多种观念结合，情况比较复杂。从新石器时代半坡彩陶动人的“含鱼人面”图案和印纹陶表现波涛、水纹、旋涡纹饰来看，说明我们的祖先很早就能艺术地表现以鱼为题材的图案、纹饰，对水上活动的审美能力早已具备。从半坡文化时期出土的文物看，表现鱼为题材陶器纹饰的数量远比其他题材的陶器纹饰为多，这正好说明这种审美能力、艺术表现能力已经建立在某种凝固化的审美观念上，具有全民族的意义（见鼓舞雁鱼图）。闻一多先生在《说鱼》文中已详细论证过鱼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诸多意义，充分说明它在民族文化、民族心理、民族性格中的特殊地位。

从水上活动“游”发展到陆上活动的“遊”；进而从行为方式的“游”，发展为思维方式“顺物自然”的“游”，是“游”发展的又一过程。如“天游”、“神游”等等，正是“游”观念扩展的结果。然而，尽管“游”形式可以有一龙九种的种种变化，但其内部隐藏的意义却始终不变。如“天游”，旧版《辞海》注：“天放”。“天放”，新编《辞海》注：“一任自然”。而“天”本身就是指自然。柳宗元《天爵论》注：“周庄言天曰自然，吾取之。”（《柳河东集》）据说，思维达到这种境界，能心神往来自如，涉想驰骋联翩，精神彻底自由。

从“游”的字义角度分析，又有随意性、非功利性和以畅神为目的的特点。

表现随意性、非功利性的行为特点：“罔游于逸”（《书·大禹谟》），“欲远集而无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离骚》），“含哺而熙，鼓腹而游”（《庄子·马蹄》）。上述行为表现为没有功利目的的随意的漫游。

表现畅神、“泻忧”为目的的行为：“驾言出游，以写（泻）我忧”（《诗经》）。泻忧，以出游来排遣胸中的郁愁。“乘物以游心”（《庄子·人间世》），以漫游达到散心畅神的目的。至于《论语·述而》的“游于艺”，是指“游”的对象改变，其对象从自然改变为人为设置的取乐方式、方法。“游”转化为娱乐之义，其畅神的目的不变，故仍不失“游”的本义。于是，还可有“游畋”（猎）、巡游、游学、游说、游侠等等的说法。这是取“游”行为的某一特点同各类社会活动相结合，故此行为概念上已不属旅游范畴，但仍可看作“游”的转义。当然《逍遥游》中的“游”决不会指此类意义上的“游”，况且正文中也没这方面的内容。

我国古代旅游是用独立的“游”字来表现的。从“旅”和“游”字义上的区别，我们也可以体会出作为古代旅游的“游”字上述特点。“旅”本指两地间的运动。《周易》中谈到“旅”的内容最多，但大多讲经商，或涉及旅途、住宿时发生的事，都没涉及到旅游的内容。《周易》没涉及到“游”，大概因为“游”是一种随意性、非功利行为，用不着认真，不值得占卜。据今人对传统的旅游方式总结为“旅从速，游从悠”，正是把旅游区分为条件和目的两部分。“旅”指“旅行”。“旅行”一词的词义在《说文》中同“麗”相近：“麗，旅行也。鹿之性见食急，则必旅行。”“旅”是有目的功利性行为。又“旅”字本义为师旅，《说文》：“旅，从𠂔，从从，从俱也。”《文字形义学概论》：“旅行犹偕行，谓结伴而走也。”《国语》有“旅进旅退”的兵战情形。古代武舞中也有“旅进旅退”的队形变化；“旅”原来用于战争，统一行动的纪律，施之于舞蹈（参看《中国舞蹈史话》常任侠）。从旅行的行为特点看，已有集体行动之义。但我国战国时期的“游”主要

还是个体的、散漫的活动。现在我们所讲“旅游”一词，实质上是吸收了现代旅游、西方旅游的某些特点，是“游”和“旅”双重行为结合的产物。在中国，“旅游”一词何时出现，还待考证，但不会很早；在西方，据《牛津字典》记载，旅游（TOURISM）一词的出现是在1811年，至今不到二百年的时间。现代旅游学也认为，旅游是随交通工具发展同步发展起来的，世界旅游业的兴起，是以喷气式飞机的出现为条件的，这实质上也把旅游区分为“旅”和“游”，即条件和目的关系。区别于古代“游”的行为，旅游往往是一种依赖现代交通工具团体的行为。然旅游的纯净形式，其本位意义是“游”，这是没有异义的。

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旅游的自觉时代。先秦时期同旅游有关的作品中的“游”，也有随意性、非功利性和以畅神、“泻忧”为目的的特点。屈原和庄子是同时代人，屈原《楚词》中的“游”大多实指旅游活动，具有上述的特点。《远游》：“悲时俗之迫厄兮，愿轻举而远游”。屈原通过旅游，排解心中忧愁，以泄爱国之情。我国历史上卓有成名的旅游文学作品《穆天子传》，书中常以“北游”、“东游”等词表现穆王活动区域的广泛。晋时荀勖为此书作序：“春秋左氏传”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隋书·经籍志》）。《左传》是战国初期的作品，《左传》明言穆王出游的目的是为畅神。从周穆王行迹不定行为看，这次旅游也完全是非功利性的、随意的行为。相反，如《山海经》、《禹贡》一类战国时期作品，尽管它们为战国以后的旅游提供了丰富的地理资料和传递不少旅游资源开发情况的信息，《山海经》还专门列出“乐游之山”、“游戏之山”，但其创作的原始动机仍不是旅游，故其主人公的行迹比较有序、有规律，行为往往带有某种功利目的。《庄子》书中“游”比比皆是，俯首可拾。《庄子》中的游不仅有随意性、非功利性和以畅神、“泻忧”为目的两大特点，其“游”往往同“道”结合，以“道”导“游”。《庄子·大宗师》：“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逍遥乎无为之

业。”《庄子·天运》：“古之至人，假道于仁，托宿于义，以游逍遥之虚……。”《庄子·天地》：“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黄帝在《庄子》书中是得道健行者。）《庄子》哲学上的“道”的核心就是“顺”，“顺物自然”；对自然的推崇，“天道自然”。这里的“道”和传统旅游观中“游”的特点很接近了。《庄子》书中的“道”确实可同“游”合为一体，相互替代，如《庄子·大宗师》：“夫道，有情有信……堪坏得之以袭昆仑，冯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处大山，黄帝得之以登云天，颡顼得之以处玄宫，禺强得之立乎北极，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彭祖得之……。”上述人物都是传说中的旅游大家。《庄子·山木》：“南越有邑焉，名为建德之国，其民愚而朴……吾愿君去国捐俗，与道相辅而行！……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不见崖，愈往而愈不知其所穷，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远矣！”《庄子》书中类似这种以“道”导“游”的话还有很多。在古文中，“道”和“导”两字确实可以通用。庄子借此发挥，倒也顺理成章。由此可见，庄子其文表面上狂放、豁达，而内中却缜密、巧思。

综合传统观念上“游”的特点，和《庄子》中“游”的用法，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逍遥游》题旨的用心了。就题而论，庄子其文内容应该是论述旅游观的，或者说是通过对旅游观的剖析来阐述他哲学上的“道”的。

其实，“逍遥”一词也就是指“道”，指“游”。“逍遥”一词原本含义比较复杂，发明权也不归庄子所有。《诗经》：“河上乎逍遥。”（《诗经·郑风·清人》）《楚辞》中“逍遥”一词屡见。“逍遥”一词到了庄子手中，同道家哲学中“道”的核心思想“无为”等同起来：“逍遥，无为也。”（《庄子·天运》）发明权归庄子所有了。“逍遥”解诂，就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意思。清代爱国主义学者王船山结合《逍遥游》文章注“逍遥”：“道者，向（接近）于消也，过而忘也。”“消”有消磨的意思，近乎“无为”。“遥者，引而远也，不局于心知之灵也。”“引

而远也”，开阔视野，扩大人生经历；“过而忘”是种非功利性的随意行为；“不局于心知之灵”，正是要达到畅神的目的。王船山注“逍遥”实质上是在挖掘其“道”、“游”的本质。此处的“逍遥”也兼有“游”的上述特点了。《楚辞·离骚》：“聊逍遥以相羊。”有注：“逍遥，相羊，皆游也。”也把“逍遥”作“游”解。可见《庄子·逍遥游》中的“逍遥”、“游”和庄子哲学上的“道”实质上是一回事。这又表现庄子在文章取材方法上的睿智卓识和善于开掘传统文化深层结构为其学术思想服务的特点。根据海外学者的考证方法，“道”和“遊”在字的形义上也是相通的。“道”从“辵”从“首”。“辵”即“行”，“行”分“彳”、“亍”，彳亍而行，即自由自在乍行乍止地行走；“首”即头脑，“首”居中间，表明行为的归旨所在，这又从另一角度惟妙惟肖地刻划出古代旅游者的形象和传统旅游方式的特点。鉴于上述理由把《逍遥游》同传统旅游观结合起来讨论，绝非牵强附会，望文生义。

从庄子的生活特点看，他一生酷爱自然，相信“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言要“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庄子一生同旅游有着不解之缘。《庄子》书中记述庄子言行有二十九节，从《庄子》记述庄子言行看，他自甘“辛苦奔波”，对旅游生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生活行踪不定，始终处于流动的生活状态中。《庄子》书中“游”、“过”、“往”（之）等行为动词溢于言表。他一生晋见过楚、魏、赵诸王，游历过齐、鲁等国。庄子游历楚地的机会可能更多，楚地濠梁（今安徽凤阳）至今有庄子墓（虽真假莫辨）。庄子和好友惠施著名于世的“濠上之乐”（《秋水》）争辩就发生在这里。现在人们习惯上把“濠上”作为旅游者驻足和隐逸的风景圣地的代称，把“濠上之乐”看作传统旅游审美方式，这些对我国旅游资源特点的形成，有决定性的影响。在园林建筑中，表现“濠上之乐”的“鱼乐榭”、“知鱼舫”、“观鱼栏”之类的园林建筑构件，已成为江南园林必不可少的建筑组成部分。楚文化对庄子其

人其书的影响也很深。《庄子》对楚事、楚人、楚地风貌物产津津乐道。楚国自古就多浪漫主义的社会风俗。楚人善长歌舞娱乐、性喜旅游的生活习惯对《庄子》文章形成会有一定的影响。楚国在战国时期又是我国旅游史上远游活动的发源地之一。

大凡战国时期同旅游有关的作品，都要攀附得道成仙的人类先祖黄帝，膜拜掌管物华天宝的西王母，健行多能的禹，以及和自然和谐相处长寿的彭祖；总会结合医道谈点“吐纳”、“导引”养生方法；仙人的行踪更是必不可少的内容。所谓成仙，其实就是登山，深入自然，作遁迹林泉的出世超脱的旅游者。这方面内容在《山海经》、《楚辞》、《穆天子传》中有，《庄子》书中也有，《逍遥游》也不例外。这是否在揭示我国传统旅游的文化渊源和民族性特征？

行文至此，不可回避的问题是，既然《逍遥游》同旅游有如此密切的联系，并对以后的旅游产生如此深刻影响，那么为什么自古至今历代研究庄子学说的文章，偏偏不注意其文同旅游的关系呢？其实这要历史地看问题。初步分析，可能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古代哲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知识的综合性。古代哲学往往是以科学的科学，包罗万象的学科，类似我们现在“科学学”的面目出现的；而现代所谓的古代学科，如古代心理学、古代化学、古代气象医学等等，都是按照现代科学建立学科体系的方法，把各门学科所需要的内容从古代哲学中分离出来，重新归纳、整理，成为新学科的历史部分，并非古代就有这种学科和理论体系的。战国以后，各类学科纷纷开始从古希腊中分裂出来，但在中国，在漫长的历史阶段中，统帅各类学科专业理论、学术思想的依然是哲学上的“道”，各门专业理论实存名亡。而各门学科的专业理论、学术思想要发展，要登上“知识”的大雅之堂，要得到社会的承认，只有依附“道”的羽翼；否则统统被贬低为雕虫小技，沉溺在此实践中就会被斥之为不务正业或玩物丧志。即便是近代，我国传统学科，如中医、武术、绘画、书法等等专业理论的归旨还在于玄妙的“道”。我

国传统旅游理论也是以同样的方法纳入“道”的轨道，具体地说，是纳入道家哲学上“道”的轨道。古代西方虽也有知识综合性的特点，但从基因上看没有这样突出、明显，尤其是西方社会经历文艺复兴时期和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各类学科已完全脱离古代哲学的襁褓，建立起专业化的理论体系和学科哲学。

旅游是门后起的学科。“旅游”(TOURISM)一词出现至今不到两百年。旅游业的兴起时间更短，从二次世界大战算起，至今不过半个世纪。根据一般学科理论体系的形成规律，总是先建立学科，再从古典中寻找适合本学科所需要的素材和学术思想，作为新学科理论体系的渊源。二次世界大战前旅游业还没兴起，旅游学还没形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再则，人们对旅游理论的敏感程度，是随旅游业自身的发展同步增长的。换言之，只有今天旅游业大规模发展，才能引起人们对旅游理论的重视和研究。在旅游还没能成为独立的学科，现代旅游又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的年代里，以往的治庄者未能就《逍遥游》对旅游的影响作专题讨论也是很自然的事。旅游又是一项多行为、多含义的综合活动，由于历史的原因，对此活动中诸行为的敏感程度也会不同，这也是造成人们对其文归旨认识上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从《庄子》的文章风格看，其言语“汪洋自恣以适己”（《史记》），其说理“其言宏绰，奇旨玄妙”（汉刘向），其内容“皆空语无事实”（《史记》）。文章语言的模糊性和概念的超越性是《庄子》最大的特点，所以读《庄子》只能靠意会和直觉感受。《庄子》中不少思想在其流传过程中也会有很大的改变，如《逍遥游》中的“无何有之乡”，《齐物论》中的“朝三暮四”，《应帝王》中的“混沌不分”寓言，其实际涵义同作者的原意已有了根本的改变。这又决定我们读庄子文章不能光从文字表面去理解，应该对庄子其人其文其思想进行全面综合考察，并结合其文的社会效果综合分析；而传统做学问的方法总是把引经据典作为唯一的治学方法。尤其是对《庄子》这

鼓舞雁鱼(四二三×五八公分)

河南南阳出土

